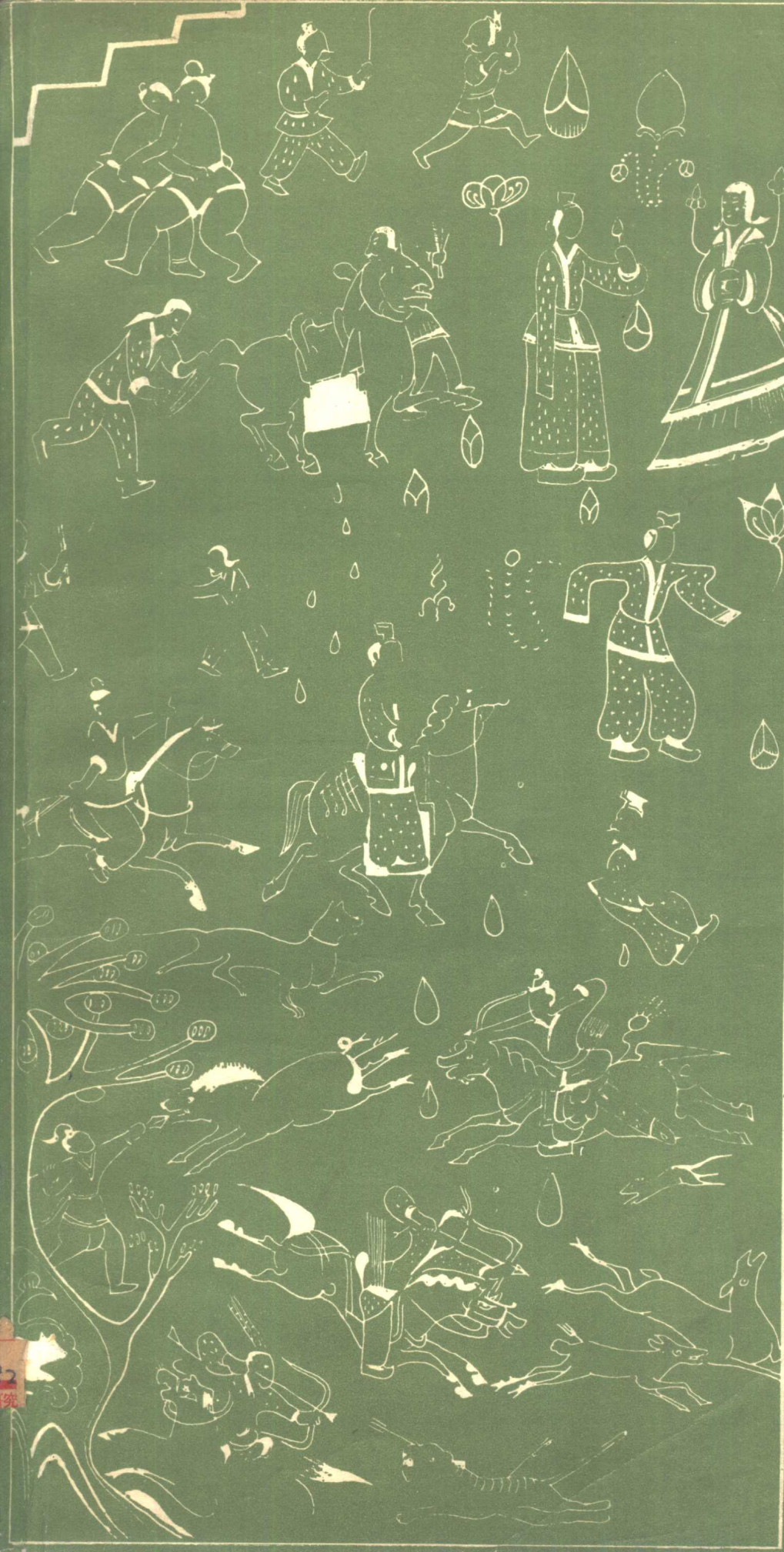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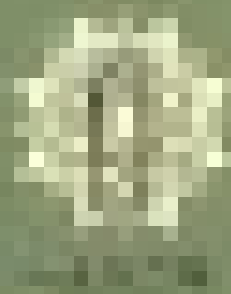
东北考古与历史



一九八二年



东北地方史





东北考古与历史

(丛刊)

第一辑 1982年

编者 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员会

长春光复大路1号 吉林省考古学会

哈尔滨南岗红军街50号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沈阳和平区四经街二段三里9号 辽宁省博物馆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国内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国外发行者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信箱2820

1982年9月出版

书号: 11068·915 定价: 2.70元

东北考古与历史 (丛刊)

第一辑 一九八二年

1	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王承礼 张忠培 林 沅 方起东
8	东北历史和考古中的几个问题.....佟柱臣
23	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许玉林 许明纲 高冀璇
42	肃慎、燕亳考.....张博泉
51	契丹原字“夫”音值考.....高路加
53	清代官员巡查东北边境的记录.....吴文衡 李士良
65	清初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概述.....孙占文 吴文衡
72	吉林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活环境的探讨.....姜 鹏
80	试论吉林西团山文化晚期遗存.....刘振华
85	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方起东
89	渤海城址的发现与分期.....魏存成
95	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 ——辽代五国部文化类型的提出与研究.....孙秀仁 干志耿
104	辽金时代的火葬墓.....景 爱
116	河北兴隆金墓出土契丹文墓志考释.....阎万章
124	大定路为金代北京路考.....郝思德
126	吉林省近年发现的五颗元代官印.....张中澍
136	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
141	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市博物馆
154	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174	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李逸友
184	松花江中游和嫩江下游的原始文化遗址.....丹化沙 谭英杰
191	延吉德新金谷古墓葬清理简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200	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和 龙 县 文 化 馆
211	辽代饶州调查记.....冯永谦 姜念思
220	科右前旗前公主岭一、二号古城调查记.....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226	吉林省前郭县出土的金代犁铧铜范.....刘景文
228	朝鲜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墓.....云 铎 铭 学
231	苏联滨海边区的渤海文化遗存.....林树山译 林沅校

Memoris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Northeast China

Vol. 1

Main Contents

- Wang Chengli, Zhang Zhongpei, Lin Yun and Fang Qidong,
Archaeology in Northeast China..... (1)
- Xū Yulin, Xū Minggang and Gao Meixuan,
A General Survey of Neolithic Culture and Bronze Culture in
Lüda Prefecture (23)
- Wu Wenxian and Li Shiliang,
The Authentic Records Written by a Qing Dynasty Official, during
His Inspection Tour on the Northeast Border..... (53)
- Jiang Peng.

The Surroundings of Mankind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in
Jilin Province (72)
- Liu Zhenhua,
On Late Xitianshan Culture of Jilin (80)
- Sun Xiuren and Gan Zhigeng,
Wuguo Trib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aterial Culture..... (95)
- Jing Ai,
The Cremation Tombs of the Period from Liao to Jin(104)
- Archaeological Team of Jilin Province and Others,
The Wall Faintings Tomb No. 1 at Changchuan.....(154)
- Li Yiyou,
The Stone Carvings of Yelü-Zong's Tomb and the Tablet on Side
of it.....(174)
- The Yanbian Museum and Others,
Excavation of the Bohai Tombs at Beida, Helong County.....(200)
- Feng Yongqian and Jiang Niansi,
Reconnaisances of the Site of Raozhou City (Liao Dynasty).....(211)

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

王承礼 张忠培 林沄 方起东

祖国东北，从大兴安岭到长白山地，从渤海北岸到黑龙江畔的广袤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不少民族的活动，在我国和东北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还曾在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历史舞台上担当过重要角色，占据过显著地位，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开展东北考古，深入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不但对于正确阐明东北各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阐明东北地方历史和伟大祖国的历史，乃至对于全面认识东北亚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放以前，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只接触到不多的几个地点，既不深入，又缺乏纵横的连续性，所得到的资料，远远不足以使人们对这一地区古代的整体文化面貌形成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认识。解放三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工作。东北考古时间和空间上的许多空白，不断为引人注目的新发现所充实，东北古代历史链条中的许多缺环，不断被与日俱增的新成果所接续。现在，东北地区丰富多采的考古学宝藏已经初步打开，东北古代文化发展的大体序列已经日渐明确。东北考古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东北古代历史的知识，新的资料、新的结论正在逐渐

充实、改变并替代人们对东北历史的旧印象、旧认识，使古代东北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轮廓愈来愈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总的来看，东北考古的成绩是显著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本溪庙后山和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我国东北是人类最早栖息和开发的地区之一。喀左鸽子洞是距今约十五万年左右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洞穴遗址，表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曾锲而不舍地对开发这一地区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及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布东北全境。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发现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凌源八间房、建平南地乡、榆树周家油房、安图明月沟、呼玛十八站、满洲里札赉诺尔等。以上发现初步建立起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的年代序列，反映了我国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远古居民的最初联系。考古资料证实，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华北、东北、东北亚以至北美洲，盛行一种以楔形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传统，由于这一工艺技术传统中年代最早的遗存是在华北发现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东北地区这一类遗存出现的年代也相当早，而且应是这一工艺传统由华北向东北亚以至北美洲传播的中间环节。

海拉尔市西郊的早期遗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中石器时代，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

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材料。

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东北各地的不同居民集团，根据各自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而丰富多采的文化。东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不胜数。近年来，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区分和系列编年，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辽西，初步区分出林西沙窝子类型、红山类型、富河类型和小河沿类型；林西沙窝子类型年代较早；红山类型分布地域偏南，出土陶器包涵许多与仰韶文化类似的因素；富河类型分布地域稍微偏北；小河沿类型很可能是红山类型的承袭和发展。沈阳新乐遗址下层距今约六千年，它和新民偏堡遗址代表着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两个不同阶段。辽东半岛以土珠子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作三层：下层与沈阳新乐下层较为接近；中层受大汶口文化影响比较强烈；上层约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扎鲁特旗南勿呼井、吉林虎头砬子、珲春六道沟、密山新开流等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东北西部、中部、东部和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有了新的了解。密山新开流是距今约五千多年的遗存，表明东北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年代亦并不甚晚。大量考古资料还证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盛行的压制细小石器的技术，不但曾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中占居瞩目的地位，而且在东北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不同文化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因素。这一现象又一次证实，“细石器文化”的概念是不确切的：压制细小石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石器加工技术，东北地区包含这种技术因素的遗存很多，应当根据各不相同的组合和共生情况，区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

东北考古的进展，已经能把一些广泛使用石器但已经出现青铜冶铸技术的文化，从过去笼统归属“新石器时代”的现象中分离

出来。东北地区青铜文化起步的年代整个来看并不比黄河流域的晚。这里的青铜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系统：一个系统以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周青铜文化为代表，属于黄河流域古代青铜文化，呈现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当地小河沿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出土有小件铜器，文化面貌具有许多早商的特点，被认为是早商文化的组成部分。商周青铜器窖藏多发现在辽西地区，其分布的东界可越过辽河达到抚顺市郊，向北则一直达到扎鲁特旗西境霍林河上游。另一系统青铜文化的分布一般稍稍偏北，也达到相当水平。在这里，青铜多用于铸造短剑、矛、斧等武器和小刀、环、扣等。这一系统的青铜文化包括白金宝类型、汉书上层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在辽西地区的分布常常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重合，年代约当春秋至战国初，有人推测可能属于早期的东胡族遗存。林西大井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古代铜矿山遗址，包括露天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序，距今约两千七百年至两千九百年，对于了解东北的青铜文化，是一个重要发现。青铜短剑是这一系统青铜文化中较常见的文物。多年来，对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进行了探讨，对其分布、类型、年代已有一定了解；至于族属问题，尚存在不同认识。从目前的材料看，由于这类短剑分布相当广阔，延续的年代不算很短，而且常常出现在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存中，所以，尽管它本身具有鲜明的特色，但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遗物，其族属不大可能是单一的。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个来看，南部比北部先进，西部较东部发达。镜泊湖南端莺歌岭遗址上层距今三千年左右，年代比许多青铜文化遗存更晚，但这里并没有发现铜器，意味着当东北大部分地区正经历着青铜时代，领受着金属文明带来的

灿烂光辉和浓重阴影的同时，这里的主人可能还仍然停留在原始古朴的新石器时代。

燕、秦、汉在东北南部地区建立统治及其势力的发展，对东北古代历史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东北考古上铁器的出现，铁器时代的到来，与这一背景是直接相关的。经过多年调查，弄清了横亘在东北南部地区的战国—汉长城遗迹，并在长城沿线发现了一批古城、障堡、关隘、烽燧、墓葬等遗迹。旅大和集安曾出土镌有铭文的战国铜剑和大量战国货币；东宁团结遗址曾出土战国式铁镰，同时出土的高圈足豆和罐式豆与春秋战国的豆相仿，反映了战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汉政权对东北地区的建设曾付出过成效卓著的努力。目前，在东北南部发现的汉代城址达20多处，而汉代的遗址甚至一直向北分布到吉林市。近年来，根据地望和出土遗物论定了宁城黑城子为汉右北平郡址，丹东鬲河尖村城址有人提出即汉西安平县址；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始建于战国，可能是西汉辽西郡文成县旧址。这些成果，使汉代在这一带历史地理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沙巴营子古城和辽阳三道壕村落遗址的发掘，以及辽东半岛上千座汉墓的清理，反映出战国—汉在辽西、辽东一带的社会生活的面貌。吉林西团山文化晚期陶器常常与汉陶共生，有的器形明显地显示汉陶样式，体现了汉文化对东北中部地区的土著文化曾发生过强烈影响。

西丰西岔沟墓地，使我们看到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东渐的足迹。近年来，在东辽石驿、赤峰、翁牛特旗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与之雷同的墓葬和文物，据目前所知，其东界可达到榆树。

大兴安岭东侧的辽阔草原，是古代东胡族的故乡。1980年夏天，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里，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

等来此致祭时所刻之祝文二百零一字，证明了嘎仙洞即拓跋鲜卑的“旧墟石室”，这一发现不但为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和多民族祖国的历史补充了重要资料，也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和古代民族分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鲜明的座标，是东北考古学一项令人振奋的突破。陈巴尔虎旗完工、札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等地的墓葬，是东汉至三国时期拓跋鲜卑的遗迹，对于研究拓跋鲜卑社会的演进和南迁的历程，提供了一组序列连贯的珍贵资料。扎鲁特旗查布嘎吐和白音温都发现的人面刻石，大抵是鲜卑人崇祀祖先和部落大人的遗迹。北票房身发现的石板墓群和锦州、义县等地发现的鲜卑墓葬，特别是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及其妻族墓葬的发现，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公元三至四世纪辽西地区鲜卑族在汉文化影响下迅速封建化的历史情况。冯素弗墓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鲜卑族传统风俗，但主要部分却使用了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层的制度，说明在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浩荡历史洪流中，北燕的物质文化的主体基本上已是封建的汉族文化。

古代高句丽族崛起于浑江之滨的桓仁，不久迁都鸭绿江边，集安的国内城是高句丽前期的都城。历年来，通过对集安、桓仁、抚顺等地的城址、交通道、建筑址、墓葬和古墓壁画等高句丽遗迹比较全面的考察，使我们对高句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的了解。这一带高句丽墓葬的数量相当大，类型相当多，应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在较长时间积累起来的遗存。早期的积石石圪墓，可能早在高句丽建国以前很久就在这一带流行了；而晚期的封土石室墓，则可以延续到渤海、辽、金以至更晚的历史阶段。禹山四十一号、麻线沟一号、长川一号、长川二号和五盔坟四号等新发现的一批壁画古墓，为研究高句丽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增添了丰富的形象资料。长川一号墓的壁画，直接描绘了

当年统治阶级对佛和菩萨的顶礼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是仅见的一例。古墓和遗址出土的铜釜、铜鼎、铜洗、铜镢斗、铁锺、铁斧、铁锯、白玉耳杯、鎏金马具、黄釉陶器等大批文物，不仅展现了高句丽物质文化的面貌，同时也鲜明地反映着古代中原各族对高句丽的影响。

隋唐考古资料，主要是在朝阳一带陆续发现的一批墓葬。朝阳是隋唐时期营州治所，是当时中央政府与东北各族往来的枢纽。朝阳县凌北公社新荒地村发现的韩暨墓，墓志中保存有隋代营州籍官吏韩暨曾多次往来于营州和东北各族之间的珍贵记录。阿鲁科尔沁旗乌兰斯木发现的“大唐营州都督许公德政之碑”残石，是研究唐朝在北方地区的行政措施，以及中原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史方面的实物资料。

唐代渤海考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订了一批重要的渤海古城，如敦化敖东城为渤海的旧国，和龙西古城为渤海的中京显德府，桦甸苏密城是渤海“营州道”上的重要州府等，这些地点的确定，把唐代渤海的历史地理勾勒出更加切实的轮廓。另外，在东宁团结渤海村落遗址清理了一批小型半地穴式房址，对渤海平民的住宅形式和生活面貌增加了了解。敦化六顶山墓群是渤海前期王族的墓地，贞惠公主墓的发现和出土的石狮、玉璧、碑刻等珍贵文物生动地表明，在历史上被誉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其文化在实质上是唐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最近在和龙海发现的贞孝公主墓，第一次展现了渤海的壁画，画有十四个人物形象，绘画风格和服饰制度都与唐王朝相同，是唐代渤海考古的重要收获。此外，还在和龙河南屯、和龙北大地、海林山咀子和东宁大城子清理了一批渤海墓葬。琿春马滴达塔基和和龙高产寺庙址的清理表明，渤海与当时中原一样到处兴修塔寺，信奉佛教。近年来，还对渤海古城和渤海陶器的分期作了

一些探索，提出了以文王大钦茂迁都上京为界线，将渤海古城和陶器大致区分为前后两期的初步意见。

辽代考古的重要收获，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对宁城大明城中京遗址和林东上京遗址等都城的勘察和发掘，为系统研究辽代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中京遗址的平面布局和文化内涵表明，这座兴建于辽代中期的城市，是模仿北宋汴京开封城的制度建设起来的。辽代城址的分布，不只集中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而且在整个东北的中部以至北部也相当稠密。其中地理位置偏东部的城址有不少沿用渤海故城，而西部草原上的城址则差不多全是辽代新建的。这一事实说明，尽管辽代统治者实施“因俗而治”的政策，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当时在草原深处，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亦都有空前的发展。一大批辽代古城的调查和考订，是辽代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虽然对某些城址（如泰州）的认定还持有不同意见，但就整个辽代历史地理知识来说，近年来的明显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呼伦贝尔西部在根河一线过去被误认为“成吉思汗边墙”或“金源边堡”的那道土筑边墙，经新近的实地勘察，已确定属于辽代修建，全长七百公里。有人认为它是辽代中叶以后为防御属部羽厥、室韦、北阻卜等族窜扰而构筑的军事防御工程。

《隋书》等文献记载，契丹族在唐代以前盛行类似天葬的葬俗，这种葬俗很可能一直延续到辽代早期；已经清理发掘的辽墓多属中晚期。契丹人葬制方面的改变，应是社会生活由游牧转向定居的曲折反映。辽代墓葬包括有砖室、石室、石棺、石槨和陶罐等多种葬法和葬具。呈现这种复杂状况的原因，有的当与僧俗对死者的不同处理有关，有的则应与辽代社会包含有许多不同民族成分相关的。契丹人的墓葬形制虽因时间早晚不同而变化较大，但浓厚的民族特点却一直

保持下来，墓葬中常见有铜面具、铜丝手足网络、铜铁马具以及辽三彩等富有民族特色的随葬物品。辽代的汉族墓葬，则与中原地区的宋墓近似。绥滨墓葬出土文物显示着女真族文物的特色，有人提出其年代应早于金代，属于辽代的一种地方文化——五国部文化。随着大量辽墓的发掘清理，随着辽墓分期的逐步建立，使人们对辽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辽文化的发展演变有了新的认识。在清理的辽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随葬品丰富的赤峰大营子駙马墓，出土“小帐”、丝织品和绢画的法库叶茂台辽墓和保存有精美壁画的库伦勿力布格辽墓、法库叶茂台肖义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和敖汉康家营子辽墓等。喀喇沁旗鸽子堂洞附近的耶律琮墓神道碑长达四千四百多字，它与叶茂台北府宰相萧义墓志、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志等，为了解辽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增添了内容。翁牛特旗毛不拉沟“故耶律氏铭石”和阜新卧凤沟“许王墓志”等铭刻文字属于契丹小字；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北大王墓志”和朝阳柏木沟“耶律延宁墓志”等铭刻文字属于契丹大字，这些新出土的契丹文材料，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工作的进展。

在辽上京遗址附近，调查了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白瓷窑址、巴林左旗白音戈洛村茶釉陶窑址和巴林左旗小辛地南山坡三彩釉陶窑址等，对研究辽代陶瓷工业发展史有重要的价值。辽中京附近的赤峰缸瓦窑瓷窑址，曾采集到一件“官”字款匣钵，而这里的地望与文献记载松山州西十公里的“官”窑位置又正吻合，为寻找辽代官窑址提供了线索。

辽代盛行佛教，造塔之风很盛。大部分辽塔作六角或八角密檐实心式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这一点曾吸引着不少部门的注意。

扎鲁特旗、科右中旗和科右前旗等地的摩崖墨书题记，是近年考古的新发现。题记

包括汉字、契丹小字、女真字、畏吾尔文、古蒙文和藏文等多种不同时期在不同民族中使用的文字，是这一地区多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辽代的遗迹。

金代的城池大抵沿用辽代。宁城大明城曾是辽代的中京，至金代改称北京路。根据金代文化层揭露出来的情况看，在金代该城布局有很大变化，无有规则可寻，民居多为半竖穴式的小型房舍，形制简陋，与辽代的整齐格局和宽房大屋形成鲜明对比。房舍设置火炕是各地发现金代房舍的鲜明特点。经调查试掘确定，曾经出土金代“蒲峪路印”的克东金城古城，即金代的蒲与路故址。蒲与路是确定火鲁火曷谋克和金代极北疆界的座标基点：《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米、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曷谋克地为边……”，表明当年金代辖境远及外兴安岭地带。

起自大兴安岭东麓，绵延逶迤直抵大青山北部的界壕，是金朝为抵御西北方蒙古族进袭而构筑的，它从金代初年开始修造，至承安初年告竣。这一浩大工程既是蒙金激烈对峙的见证，也是衡量金代东北地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尺。经多次调查，对其走向、形制、设施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东北地区中部和北部普遍而大量地在使用铁器当在金代。除了在金代城址和遗址中出土大批铁器而外，在集安、怀德、吉林、靖宇等地都曾发现过许多窖藏的铁器。在金朝前期都城上京会宁府故址阿城东南的小岭、五道岭一带，还曾发现金代早期的冶铁遗址，包括古矿洞十余处和冶炉群五十余处，说明早在金代初年，冶铁业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金代窖藏铜钱非常普遍，各地常有唐、辽、宋、金等朝大量铜钱同时出土；铜镜背面边缘篆刻官府印记文字和押记，是金代遗物的鲜明特征之一。这

些情况显然与金朝境内缺铜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近年来调查清理的金代墓葬，包括各不同阶级和阶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舒兰小城子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锦西大卧铺画像石墓、朝阳马令墓、赤峰三眼井金墓、扶余金墓和绥滨中兴的金墓等。

延吉城子山山城和宁安镜泊湖四季通城子后山城等地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对金末蒲鲜万奴割据势力东真国的文化面貌得到了具体认识。

元代考古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应昌路的调查、阿鲁科尔沁旗和额尔古纳河畔黑山头元代古城的调查等。北票上园老虎沟清理的元代民居，反映了元代这一带的日常生活。吉林省境内出土的一批八思巴文铜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残余势力曾在这一带盘踞的史实。

年代晚近的明清，在考古学上一般不占重要地位。然而对于东北来说，由于文献记载较少，加之清朝统治者曾大肆销毁和窜改历史资料，致使明清考古仍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洮安出土的“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进一步证实了明代在东北建立卫所体制进行统治的历史。吉林市原名“船厂”，是明代经略和开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对吉林江南阿什哈达刻记着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明朝曾多次在这里驻军和造船的摩崖刻石，展开了研究。宋不花和崔源是两位列名明奴儿干都司治所附近永宁寺碑的明代官员，鞍山倪家台崔源族墓出土的七合墓志和崔源墓志（1450年），记载了从永乐到嘉靖历一百五十年间明朝政府管理东北地区及东北边疆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大量史实。辽阳鹅房村发现的宋国忠墓志还追记了其“高祖卜花（不花）袭（爵）招谕奴儿干，征进三叉路有功，历升明威将军”，证明了明代政府曾不断加强对

奴儿干都司的管理。

吉林乌拉古城和辉南辉发古城是海西女真乌拉部和辉发部的中心城堡，这两座古城出土的明代文物说明早在清王朝建立之前，满族就已经大力汲取中原先进文化。齐齐哈尔发现的“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是康熙年间“平定罗刹故物”，是反映雅克萨之战的珍贵文物，是十七世纪我国各族军民抗击沙俄侵略的物证。巴林右旗十家子发现的荣宪公主与乌尔袞合葬墓中出土墓志一合，志文记载了乌尔袞曾参加康熙平定策旺叛乱，反映了康熙实行各民族和睦，打击沙俄制造民族分裂，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此外，近年来还对清代的柳条边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从上面很不全面的概述中可以看到，东北考古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东北考古毕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至今尚有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去开拓。为了深入开展东北考古，有不少问题已经开始引起许多同志的持续关注。

首先，由于考古工作开展得不平衡，不少方面工作尚很薄弱，有的甚至至今仍然是空白。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存，除了在南部地区有所发现，整个中部和北部尚有很大一片空缺，需要进一步去发掘。再如，在已经发现的考古文化中，还有一些如密山新开流遗址等，还显得比较孤立，缺乏纵横的环节，使之与一定地区、一定系列联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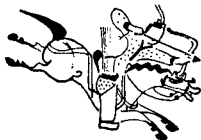
其次，为了充分阐明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扩大研究成果，尚需大力加强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与积累的大量田野调查和发掘资料相比，这一部分工作进展比较迟缓。如区分各种不同文化类型、建立编年序列、弄清分布范围等研究工作，认真地说还只是开始。至于利用考古资料来恢复历史，做得就更差一些：尽管在介绍和叙述遗迹的文章里，通常也注意对遗迹所反映的一般生产情

况和生活状况作一些推导，但从全局着眼，系统地综合有关资料，对整个社会面貌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探索，显然是不够的。室内研究和田野工作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田野工作是室内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科学、更合理地组织田野工作，准确判别每一宗发现的意义，区分轻重缓急，选择典型遗存，集中力量，攻克关键，使田野考古工作不断有明显的突破。

第三，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正确判别不同文化的族属，确认不同族的文化特色和演变序列，是东北考古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认真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确定各种不同文化的内涵和分布范围、科学地建立考古文化的序列和编年，是全面解决这一课题的必要前提。另外，在东北历史舞台上，不同族相继崛起、强盛并忽然占据了这个舞台的主要地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有的历史学家将之视为历史之谜。要解开这个谜，在相当程度上有待于考古学的进展，有待于对同一时期存在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族别文化的研究和确认。解放以来，对于东胡、汉、拓跋鲜卑和匈奴遗迹的推定和研究有了若干进展，近年来，还对靺鞨、辽代女真文化的识别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但就总的来看，这方面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秽貊、夫余、挹娄—靺鞨、室韦等物质文化的研究工作，显得更其薄弱，尚需给予更多的关注。至于高句丽前期、早期契丹、建州女真，以及古书上提到的许多较小部族或民族的文化面貌，可以说至今还仍然处于非常朦胧的状态。

第四，在时间上平行或相互衔接、地理上相互毗连的考古文化总是相互影响的，无论从大范围或小范围来说，情形都是如此。在东北考古中，除了在小范围内各种文化具有多方联系之外，从大的范围来看，整个东北的古代文化，与我国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鲜明的历史现象，吸引着许多考古工作者的普遍注意。但是，东北各地各个时代所处的不同地理和历史条件，也决定着各种考古文化不能不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深刻揭示当地各种不同文化的形态和形成过程，才能具体认识和估价黄河流域古代文明怎样对东北产生了影响；共性包含在个性之中，只有深刻揭示当地各种考古文化的特征，才能正确阐明东北古代文化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地位，科学评价东北古代各族对祖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最后，为了做好整个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还需要加强各有关省区和有关方面的交流和协作。这不但是因为相互学习和交流有助于考古科学水平的提高，也还因为许多遗迹单位和古代文化的分布、联系都是跨越现行省区的。如果都囿于省区的界限独自进行工作，就不可能得到系统而完整的资料。因之我们认为，需要不断扩大有关方面的合作，加强学术交流，商讨和制订学术研究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调查和发掘，共同探讨和解决东北考古学上的重大课题，建立一些情报资料中心，不断用现代化手段装备田野考古和室内工作，以期能比较迅速地把东北考古的研究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作出贡献！



东北历史和考古中的几个问题

佟柱臣

东北史是中国史中的组成部分，东北名称是近世就中国东北方位而言，所以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教授的释义指出：“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三月“乙亥，谕内阁，……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②。此后遂有东三省之名，辖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辽阔地区。《辽史·兵卫志》中的东北路，《金史·地理志》中的东北路，虽然都称为东北路，那是就辽、金各自的方位说的，其历史含义和地域大小，与近世史上东北一词，是迥乎不同的。东北部分地区在古代史中也称过辽东或辽海，《史记·苏秦传》：“燕东有朝鲜、辽东”。《辽东志·地理志》解释辽东说：“辽东，秦名，《韵书》：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又兼辽西而言。”《晋书·载纪上》：郭庆穷追慕容评“至辽海”。《乘轺录》解释辽海说：“辽海即辽东也”^③。但无论辽海或辽东，仍属部分方域之词，也不可近世东北名称相等。东北的地域，就十九世纪的历史实际来说，它是包括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在1931年以后，东北又曾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鲸吞，所以东北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硬以满洲这个族名来代

替东北这个地方名^④。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则渲染渤海、契丹、女真诸族的所谓独立性，以割断她们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这些都是违背历史实际，肆意篡改历史的。

一 东北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

中国的正史之中，自《史记》、《汉书》到《明史》合称为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清史稿》共二十六史。在这二十六史里面，属于东北史方面的或和东北史有密切联系的，有《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和《清史稿》，占五分之一稍弱。这个数量，表明了东北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列入正史的，是经历史的自然抉择，有其标准的，首先是要代表一个统一全国的朝代，如元、清便是。但是在西北、西南的民族中，以作为一个朝代史而列入正史的，是没有的。其次是要代表一个统一大半个中国的最大的地方政权，如辽、金便是。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总裁官”。（《元史·顺帝本纪四》）脱脱把与辽、金并世的西夏，列入《宋史·夏国传》，而对于辽、金则别立二史，这也表明《辽史》、《金史》重于西夏史。《辽史》根据辽耶律俨《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等书，由元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分撰而成。《金史》根据金代实录、金王鹗《金史》等书，主要由欧阳玄撰成。无论撰写《辽史》或

《金史》，都有义例问题的争议，实质上也是对辽、金地位的衡量和包括对多民族史的史观问题。金修《辽史》所谓义例问题，是金朝继哪个朝代的帝统问题^⑤，元修《宋书》、《辽史》、《金史》所谓义例问题，或者主张从《晋书》例，辽、金以《载纪》列入《宋史》，或者主张从《南史》、《北史》例，《辽史》、《金史》作为北史^⑥，最后终于决定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辽史》、《金史》才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因为辽、金在宋时都是在北方占有大半个中国的最大的地方政权，这在其他少数民族史中是罕见的，因而把《辽史》和《金史》列入正史之内，是颇有道理的。那么因为什么作者把《元史》、《新元史》也看做与东北史有密切联系的部分呢？因为七世纪蒙古兴起于望建河（今黑龙江）地方，《旧唐书·室韦传》有蒙兀室韦，蒙兀与蒙古音近，十四世纪伊儿汗国史家拉施特丁的《史集》说蒙古人谓其祖先来自额尔古涅·昆，昆为河，即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指出：“呼伦贝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蒙古人……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⑦这些史实说明东北西部的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草原是蒙古族兴起之地，因而把《元史》、《新元史》列入东北史研究范围之内，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总之辽、金、元、清诸史，在中国正史中占了一定数量，这就表明了东北史在中国史中的重要性。至于《太平御览·四夷部五》引有《肃慎国记》；《魏书·封懿传》记封懿撰《燕书》；《隋书·经籍志二》记：“《燕书》二十卷记慕容僞事，伪燕尚书范亨撰。《南燕录》五卷记慕容德事，伪燕尚书郎张詮撰。《南燕录》六卷记慕容德事，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南燕书》七卷，游览先生撰。《燕志》十卷记冯跋事，魏侍中高闾撰^⑧。

《十六国春秋》一百卷，魏崔鸿撰。……《南燕起居注》一卷。”《史通·正史篇》记《燕纪》燕杜辅撰，《唐书·艺文志》记“张建功《渤海国记》三卷”，以上诸书虽然无存，但其佚文转见他书，是颇有益于东北史事的。

其次，辽、金、元、清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中世纪以后，所以我们又说，东北民族在中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得更加有声有色。因为契丹虽然早在登国三年（公元388年）与北魏道武帝接触，在《魏书》中立有专传，但是辽的建国则在辽太祖神册元年（公元916年），其地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肭河，南至白沟，幅圆万里。”（《辽史·地理志》）金太祖阿骨打于辽天庆五年即金收国元年（公元1234年）即皇帝位于宁江州，地域比辽更大，南边已达到淮水至秦岭之间。元，自世祖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国以后，是个统一全国、建立了四大汗国的王朝。清朝，早在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清太宗给崇祯皇帝的信里说：“予纘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⑨可证清在入关以前，已经辖有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至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九月七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制止了沙俄的东侵。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康熙命十四王允禔摄抚远大将军，进军西藏，有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⑩，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立碑于拉萨布达拉宫。至高宗弘历，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军登新疆格登山，击溃了准噶尔叛军首领达瓦齐，乾隆自撰《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立碑于新疆昭苏县西北松拜河东岸的格登

山上^⑩，回师之后，乾隆再撰《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立碑于承德普宁寺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清军平定了阿睦尔撒纳，乾隆撰《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仍立碑于普宁寺内^⑪。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追捕回部叛首大小和卓木，进军帕米尔，于雅什库里北岸建立了乾隆所撰《平定回部勒铭伊西库尔淖尔碑》^⑫（今碑存塔什干博物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由于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摆脱沙俄控制，不远万里，回归祖国怀抱，乾隆又撰《土尔扈特归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立碑于承德普陀宗乘庙内。拉萨还有满藏汉三体文字的乾隆《御制十全记碑》，历记乾隆时期五十七年之间的十次武功。这些碑刻都证明清人对于保卫祖国边疆和巩固祖国多民族的统一，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因而东北史在中国历史整体中，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

二 东北民族是与华夏族接触较早的民族

东北民族中的肃慎族与华夏民族发生关系是较早的，《史记·五帝本纪》：“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息慎，《史记集解》“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可知舜时北有山戎和肃慎。《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能理三苗，纳肃慎。”也记舜时有关肃慎事。但是虞舜属于传说阶段，姑引于此，以待证实。《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殷，……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周书·王会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厓”。“孔晁注，稷慎，肃慎也”。《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这些文献记明息慎、稷慎即是肃慎，而肃慎位于周之北。《尚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也有相同的记载，因为肃慎去贺西

周成王，所以成王命与周同姓的畿内诸侯荣伯作了赏赐肃慎的诰命。如此记载相同而又较早的文献，是可信的。《国语·鲁语下》：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的引文，又可证春秋时期的孔子也还知道肃慎的情况。而西团山文化，推断有可能是后来肃慎的遗存^⑬。关于山戎、东胡，《史记·匈奴传》：“唐虞以上有山戎”。说明山戎也出现在传说阶段的唐虞以前，同传又记：“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这是山戎在春秋时期与齐、燕的接触。东胡，《史记索隐》引东汉服虔注，说东胡“因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汉书·匈奴传》：“燕北有东胡”。东胡在战国时期，时而在燕境之内，时而在燕境之外。《后汉书·东夷传》说明了包括肃慎在内的东夷与华夏族的总的关系，“《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东夷率皆土著，烹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记述了东夷平和，肃慎在周公东征以后，与周室往来更多，并且接受了中原的俎豆饮食方式。把以上东北的肃慎族同周王朝的关系与西北民族比较起来，便可发现有所差异，《穆天子传》记“乃至于昆仑之丘”，《山海经·北山经上》：“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泽。”渤泽即罗布泊，敦薨水或当今孔雀河。这是战国时期文献开始记载新疆的昆仑山和罗布泊。至于民族间的往来，《史记·大宛列传》：“于是西北国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汉书·西域传》：“西域

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所以在汉武帝时期，西域的居国和行国才与汉王朝发生了关系，这与肃慎于西周成王时来贺，相差一千年左右，所以我们说东北的肃慎、山戎是与华夏族接触较早的民族。

三 东北地区筑长城、置郡县也是较早的

中国的北方万里长城，在我国多民族的历史条件下，是南方农耕民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措施，和平时期通过关市贸易则是民族间经济活动的场所，所以属于我国多民族史上的内部问题，无论战争与交易，都是民族间发生频繁关系的证物。

东北的燕北长城，在古代的北方万里长城中，是建筑最早的一段。《史记·匈奴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造阳，《史记集解》韦昭曰：地名，在上谷，《史记正义》按：上谷郡今妨州。所以造阳、多推断为怀来。襄平为辽阳。杨守敬的《战国疆域图》北一卷中至北一卷东一上，把燕北长城绘成自独石口起，经建昌、朝阳、医巫闾、新民南境而至辽阳。燕北长城筑于战国时期是无问题了，但是到底筑于燕国的那个王时期，却是值得研究，前面文献已经记明秦开是秦舞阳的祖父，秦舞阳在十三岁之后与荆轲一起于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曾刺过秦王，如此从公元前227年向前略推三代、时间当在七、八十年。所以推断燕北长城，应筑于燕昭王时期^⑥，尤以昭王初年为可能，即或当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97年之间。我们所以说燕北长城是最早的，可见后面表一比较材料。

从表一可以看出自东北以迄新疆的万里

长城、烽燧线上，自东而西，一段比一段修建的晚，这反映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年代有先后，民族间的接触有早晚。最早的一段是推断筑于燕昭王初年（公元前311年—公元前297年）的赤峰至奈曼旗间的燕北长城；其次是筑于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1年）的河套北长城；再次是第一次筑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阴山以北长城^⑦；再次是筑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前的伊肯河至额济纳河长城^⑧；再次是筑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的敦煌北长城^⑨；再次是筑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之后的罗布泊烽燧址^⑩；再次是推断当昭、宣之世（公元前86年—公元前49年）的库车西克孜尔杂哈烽燧址。所以赤峰燕北长城比起甘肃敦煌北汉长城，要早两百多年。表明东胡统治者与燕王的矛盾，早于匈奴统治者与汉王朝的矛盾。当时所以要在北方修建万里长城而不是在南方，这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匈奴与南方椎髻之民的滇人有所不同，虽然都处于奴隶制阶段，掠夺是其职能，但是北方的骑马民族，集团的人数多，行动快，上层的贪欲强，这或者就是必须在北方修建长城的原因吧。

最早的燕北长城，是1944年在赤峰发现的。这段长城东从撒水坡起，以一条黝黑色土岭蜿蜒西北行，至北台子东坡上山，北台子东坡的长城是以石块砌成阶级式长约200米的一段石墙，底宽6米，上宽2米，残高2米，水地村北山腰、老爷庙西山腰南段，也都是同样建筑的石墙，长城爬上北台子老年期山地以后，又用黄土筑墙，宽2.4米，残高1米，长城过老爷庙又上山，经夏家店、杨家营子与五里岔望楼址相联，而在长城线上如老爷庙西山顶上、北台子东端、杨家营子山上均有望楼址，老爷庙西山顶上的望楼址附近更发现有战国式绳纹板瓦和长方形釜铁斧残片。在长城线南侧，更发现了赤峰北土城址、上水泉城址、蜘蛛山城址、山湾城

址、山头城址、撒水坡城址、小城子城址，应是屯戍之所在，赤峰这段长城，它是以长城、城塞、烽燧联合成东西长约百里的一线^②。赤峰长城之东，1975年发现了敖汉旗至库伦一段，西起敖汉旗宝国吐公社荷叶大队，经西岗岗屯后、苇塘、杏树园子到牯牛河岸，再从牯牛河东牯石头沟起，经蛤蟆山北麓、哈日干图、朝阳沟北、伸向库伦旗西北下洼，经先进公社进入阜新县境，这一段长约二百五十华里。长城一般下宽6—8米，残高1—2米，长城附近也有西土城子城址、五间房城子、沙巴营子城址^③。长城过阜新后，经彰武、新民、法库而抵开原。赤峰长城以西的长城，大概自围场延伸到多伦南境。《察哈尔通志·疆域编四》记宝昌（今太仆寺旗）、康保、化德一带仍有长城，虽然未经勘察，时代未定，但颇值得注意。我们所以推断它是燕长城，是有些依据的，如撒水坡城有山字形纹半瓦当，赤峰北土城子有素面纹半瓦当，蜘蛛山城有山字形半瓦当、三环纹半瓦当，这些半瓦当都是战国的，而山字形纹更是饕餮纹的简化形式。其次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也发现有素面半瓦当、兽纹半瓦当和布币、明刀等，都为推断燕北长城，提供了物质文化资料。赤峰至奈曼旗的一段燕北长城，比起杨守敬《战国疆域图》中所绘燕北长城的位置，向北伸展二百多里，这在东北战国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上，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东北置郡县，也是较早的。郡县制的设立，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和标志，它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对于我国多民族人民的安定生产，起了维系和促进作用。秦设郡县统一了全中国，但郡县之制，并不仅限于秦，东北南部远在战国时期，燕已经设立了郡县，正如前面《史记·匈奴传》所引，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而秦灭燕以

后所置的辽东、辽西等郡，都是因燕之旧。

《汉书·地理志》记上谷郡辖县十五；渔阳郡辖县十二；右北平郡辖县十六；辽西郡辖县十四；辽东郡辖县十八。这些虽然是西汉初期的情况，但基本上是从战国时期沿袭下来的，仍留有燕国郡县的面影。燕于东北南部直接设官，由燕王统辖，这对于东北南部的开发和管理，对于向东北南部推进封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把东北南部在战国时期设立郡县的情况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比较起来，便有很大的不同。西北如新疆，三国时期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始设伊吾县（今哈密附近），《晋书·地理志上》：“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凉州所属八郡之中有敦煌郡，敦煌郡所辖十二县中有伊吾县，所以西域的伊吾县，是敦煌郡遥辖的一县，这是中原郡县制，扩展到西域的最早记录，它比东北南部的设郡县，要晚五百多年。其次如西南，《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頌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记·司马相如传》：“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犍、牂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这些接近蜀郡的邛、笮，秦时大概已经置吏，由蜀郡统辖了。至于滇人腹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牂柯郡和越巂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所以西南的设郡县比起东北来要晚约二百年。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也是很曲折的，东北南部虽然很早的进入了封建制，但是东北北部却表现发展很迟缓，这也可以和西南地区比较一下，云南呈贡归化城北尖山、昭通桂花院子；贵州安顺宁谷、赫章可乐区；广西平乐银山岭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东汉墓，其器物形制与中原器物，已经看不到多大区别，这是汉文化在东汉时期深入到西南地区的明确物证。和西南地区相反，东北北部迄今尚未发现东汉遗迹，这说明东北南部虽然在战国时期进入了封建制设